

July 2024

Emotion and Chineseness: Shen Congwen's Continuation and
Rewriting of the Miao Region Construction in *A Country Codger's
Words of Exposure*

Wenjian Su

Zekun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Recommended Citation

Su, Wenjian, and Zekun Chen. 2024. "Emotion and Chineseness: Shen Congwen's Continuation and Rewriting of the Miao Region Construction in *A Country Codger's Words of Expos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4, (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4/iss1/1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情与中国性：沈从文对《野叟曝言》苗地建构的承续与改写

苏文健 陈泽锜

摘要：西南苗地的情爱故事是贯穿沈从文小说的重要主题，其笔下故事的发生地“湘西”也因此世界闻名。沈从文对苗地湘西的文学建构如何受到前现代文学文本的影响，却是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沈从文小说的苗地建构，与《野叟曝言》中言说苗地的话语书写之间有着重要的承续关系：一是共享明清时期的“苗地知识系统”，二是均围绕“情”和“中国性”的话语从本地人的视角对苗地展开文学空间的审美建构。具体言之，以《边城》为例，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新情势下，沈从文经由书写苗地之“情”，重新定义了“何为中国”，从而将传统文学遗产创造性地转化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另类现代性的呼吁。

关键词：情；中国性；《野叟曝言》；沈从文；苗地建构

作者简介：苏文健，文学博士，华侨大学文学院、华侨大学中外文学与翻译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通信地址：福建泉州丰泽区城华北路269号华侨大学文学院，362021。电子邮箱：sobunki006@hqu.edu.cn。陈泽锜，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研究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文化研究。通信地址：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人文学院。电子邮箱：pach2923@student.su.se。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8ZDA265]阶段性成果。

Title: Emotion and Chineseness: Shen Congwen's Continuation and Rewriting of the Miao Region Construction in *A Country Codger's Words of Exposure*

Abstract: Love stories of the southwestern Miao region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Shen Congwen's fictional works, which also contribute to Xiangxi's reputation. The ways in which Shen Congwen's 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the Miao region was informed by pre-modern literary texts, however, are often overlooked. An important connection can be observed between the portrayal of the Miao region in Shen Congwen's fiction and the similar discourse found in *A Country Codger's Words of Exposure*. Firstly, both works draw upon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regarding the Miao region. Secondly, they both explore the aesthetic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space in this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 people, emphasizing emotions and Chineseness. In *Border Town*, for instance, Shen Congwen redefines "what China is" during the country's semi-colonial period by delving into the emotions of the Miao region. Thi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literary heritage serves as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and a call for alternative modernity.

Keywords: emotion; Chineseness; *A Country Codger's Words of Exposure*; Shen Congwen; Miao region construction

Authors: **Su Wenjian**,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Research, Huaqiao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literary theor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No. 269 North Chenghua Avenue, Fengze District, Quanzhou 362021, Fujian Province, China. Email: sobunki006@hqu.edu.cn. **Chen Zekun** is a postgraduate in Asian Studies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Sweden.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Address: SE-106 91, Stockholm, Swed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Email: pach2923@student.su.se. This article is supported by the Major Project of National Social Sciences Foundation of China(18ZDA265).

自幼阅读旧小说的沈从文(1902—1988年)晚年曾指出,自己的创作之于古典文学“受总的影 响”(第16卷526)^①。前现代的中国文学传统在沈从文生命早年尚未因“被压抑”而断裂。古代中国的文学遗产和“现代”作家之间的关联,不应是一个可以被文学史回避的问题。在20世纪前半期曾经广泛流行的其他前现代文学作品对沈从文有哪些影响?其文学创作又是如何受到既有文本所承载的知识体系和话语模式之影响的?沈从文小说作为“边地文学”(王晓文153)的地方性贯穿其文学空间——苗地——的建构,和其前现代文学遗产中的苗地书写之关系如何?鉴于此,我们以清中期小说《野叟曝言》为中心,梳理其与沈从文的苗地小说之间的承续,阐释沈从文的“湘西”文学建构如何为前现代时期言说苗地的文学遗产所塑造,包括古代中国认识苗地的“知识系统”,及其小说所建构的、苗人视角下理解苗地“情”与“中国性”之话语模式。传统文学中的“中国性”问题意识启发了沈从文小说广为学界讨论的“民族国家想象”^②,而“情”与“中国性”交织的话语模式更被创造性地转化为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和对另类现代性的呼吁。

一、明清文学的“苗地知识系统”

历史地看,“湘西”和“苗地”是两个相互重叠的地理概念。“湘西”一直是“苗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在广义的“西南地区”之中(赵树冈70)。“湘西”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行政区划,特指湖南省西部“辰沅道”所覆盖的区域(罗维庆 罗中6);“苗地”则泛指中国西南非汉族群的世居地。中国古代的“西南地区”范畴并无严明边界,泛指“云、贵、黔以及川南、桂西、湘西、鄂西、西藏一带”(徐新建9)。明清时期,“苗”成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官方概称。在明清两代政策的推动下,地图中的苗疆区域逐步缩小,晚清时,仅存贵州和湘西一带,维持其与汉地的异质性(席会东44)。位处中国腹地的湘西之所以会被称作“边”城,正是由于苗文化在该地的生生不息^③。因此,本文多以“苗地”代指湘西,以突出其边地意涵。

沈从文以苗地为故事发生地的小说创作,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他常以“苗乡”命名,点明故事发生在广义的苗疆,对具体时空的交代则十分

模糊,唯见《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提及“皇上”,可知发生在中国帝制时期(彭小妍385—411)。后期大致以《月下小景》(1932—1933年)为分界(刘洪涛108),开始以“湘西”作为叙事空间。在这些小说中,虽然叙事者不点明人物的族性为“苗”,但故事中展现的非汉文化风俗,如《边城》中的“走马路”,都指向了民国初年的湘西——在经历明清的帝国治理后——苗文化的仍然在场(袁先欣165)。沈从文这两个阶段的作品,我们均以“苗地小说”来指称。

(一)“苗地知识系统”

作为虚构作品,沈从文小说中的苗乡、湘西不是对现实的透明反映和再现,而是建构性的,带有想象性成分,蕴含着有意的观念表达。虽然沈从文所呈现的苗地是一种文学建构,但也不全然是想象虚构的产物。然而,作为苗地小说的基础,沈从文获得苗地知识的途径,往往未被问题化。不少研究先验地将之归于沈从文对“当地传统、风俗及社会行为”的亲身经验和亲身听闻(张文东60),甚至追溯到抽象的“巫楚文化”的影响(周仁政63—98),或认定小说中带有民歌、神话、传说风格的片段是对“民间文学”的吸取(任晓兵128),这些均忽视其虚构的创造性。沈从文对苗人传说的书写、对边城情爱的叙述,固然基于他在苗地的具身经验和当地的口传知识,但前现代的话语遗产却是难以回避的。在前现代中国,特别是明清时期的汉语文本,已形成所谓的“苗地知识系统”,成为知识分子理解西南非汉族群的主流话语。“苗地知识系统”引申自胡晓真的“西南知识系统”,意指在现代民族学认识论下对西南地区的田野调查所生产的知识成为主流话语以前,古代中国历代“持续累积,相互参照或袭用”言说西南的知识体系(胡晓真5)。其中,对于西南非汉地区即“苗地”的记述,正是其主要内容。

明清以前的汉语文献对苗地的记述并不翔实。明清以来,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与知识分子的流动,有关西南地区的官方书志和文人书写得以涌现。这些记叙边地风土民俗的文本构成了一个“知识系统”,在大江南北的读者和书写者之中代代相传。这些由代表帝国中央立场的儒家知识分子书写的、以外来者的视角叙述的苗地知识自成一套话语,对沈从文理解苗乡和湘西所产生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苗地知识系统”在五四前后

仍发挥着不可忽略的影响。20世纪20—40年代,正是中国“苗地知识”的转型期,出现了对苗地民歌的收集、西方民族学方法指导下对苗地的田野调查以及沈从文等苗地知识分子对苗地的文学书写和历史表述(龙仙艳 43—82)。然而,这些新兴的民俗、民族学及文学话语的缓慢生产与传播,是与前现代中国的苗地知识的传承并行发展的,并未能够取代后者——即使是1933年中国官方首次在湘西开展民族学调查的报告中,作为参考资料和引证出处的文献也充斥着“苗地知识系统”内的文本,如《炎徼纪闻》《黔书》,以及沈从文曾阅读的《苗防备览》。这印证了理解一个区域、一个族群并不仅依靠第一手的亲身经验就可以完成,既有的话语遗产仍然源源不绝地影响知识生产者对当下的理解。

(二)《野叟曝言》与沈从文“思想的媒介世界”

《野叟曝言》由夏敬渠(1705—1787年)所著,成书于乾隆年间(1736—1795年),1881年又重新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既在《字林沪报》连载,又由多家出版社刊行,风行一时,“在都市公众和文人圈内产生了跨界的轰动效应”(商伟 155)。这部章回小说书写明代苏州士大夫文白(文素臣)游宦海内外、履及中国西南至欧洲大陆,以儒家教化一统天下、建功立业的故事,对中原以外的风土人情有大量描摹,其中就包括中国西南的苗地。虽然并非全文围绕苗地展开,但该书有长达18回(八十七回到一〇四回)的篇幅,记录了主人公文白出征西南苗疆边地的故事。叙事者无不刻画当地民俗,并对中原与苗地的文化差异作出评论,建构了西南苗地的异域面貌。据沈从文在《小说与社会》(1942年)一文中对民国初年“旧小说的流行”的言述,《野叟曝言》是与《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并举的流行书目(第17卷 301)。1929年,该书再次以《原著古本〈野叟曝言〉》版本发行,并数次刊印,1938年被改编为京剧,这无不昭示其持续的影响力。20世纪前四十年间,该书也反复出现在梁启超、鲁迅、林语堂、张恨水、聂绀弩、赛珍珠等人的文章中。《野叟曝言》在晚清民初持续流行,意味着对于沈从文和他的同代人而言,该书的可见度和经典性要远远高于“苗地知识系统”中的其他文本。

现有史料表明,除了《苗防备览》(1934年,《从文自传》提及),沈从文还阅读过“苗地知识系

统”中的《野叟曝言》一书(1930年,《中国小说史》提及)。沈从文与《野叟曝言》的密切联系还在于:第一,沈从文在《小说与社会》一文中将《野叟曝言》作为民国初年(1911—1921年)“旧小说的流行”现象的例子,并将之归于“多书生和闺阁仕女阅读”的类型,这正与沈从文在私塾接受教育(1910—1917年)(宋剑祥 31)身为“书生”的时间重合;第二,在《中国小说史》中,沈从文对《野叟曝言》留下“欢喜卖弄学问,更处处显出书生气”(第16卷 29)的评论,认为其艺术价值未超越《儒林外史》,写作技巧也不及《品花宝鉴》,未给出较高的文学史评价,其“学问”就包括关于苗地历史文化知识;第三,在1948年的《斥反动文艺》一文中,郭沫若曾将沈从文和《野叟曝言》联系起来,以“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攻击他,这或由于郭氏认为沈从文“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郭沫若 289),与铺陈性爱描写的《野叟曝言》有所重合,或因为郭氏认为不鼓吹革命的沈从文和文素臣一般“对封建统治者忠心耿耿”,或因为《野叟曝言》和沈从文的小说一样,都刻画了苗地的风土人情,承载了某种苗地的知识。沈从文晚年在一次接受采访(1980年)时,对“关于苗族生活的一些作品,有人说大多虚构,缺少现实依据”这一问题,不但未作出否定,更有一段值得留意的言述:“从想不到《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真实性,却要求我的作品‘真实’。”(第16卷 523)沈从文强调小说的虚构性,也生动地点明文学建构是建立在先在的知识基础之上的。沈从文的苗地小说既是一种虚构,也承续了先前的文学文本——《野叟曝言》中有关苗地的知识和话语,作为建构苗乡和湘西的话语资源。这种种资源构成了沈从文创作苗地小说的“思想的媒介世界”(media world of thinking)(Liu Karl Ko 42—43)。沈从文苗地小说与《野叟曝言》的关系,超越了狭义的“影响”关系。清末民初流行的《野叟曝言》,正是沈从文身处的“思想世界”的重要语境,成为其认知苗地的重要媒介,“苗地知识系统”形塑了沈从文的苗地建构。

(三)苗地知识的承续:从《野叟曝言》到沈从文

叙述苗地时,《野叟曝言》尤其着墨于苗人的婚恋制度和性别文化,这与明清文学的“苗地知识系统”中既有的知识相互参照、引述和引证。

“苗地知识系统”中的其他文本也偏好通过婚恋风俗的刻画强调华夷之别,建构出“男女交往自由”和“婚姻自由”的苗地形象(胡晓真 49;92—93)。“苗地知识系统”刻画异域婚恋的偏好,也渗透到沈从文苗地书写中。

第一,非包办的苗地婚姻。《野叟曝言》将苗地婚俗建构为有别于包办婚姻的形式——“峒例,必得男女两愿,不以父母之命压之;须去问了女儿,再求叔爷作伐”(夏敬渠 1120)。在沈从文笔下,婚恋自主同样被建构为苗地文化最显明的特色,如《神巫之爱》:“照例族中的尊严,是长辈也无从干预年青人恋爱。”(第9卷 382)在男女自主的非包办婚制下,《野叟曝言》进一步勾勒了苗地婚恋体制的两个具体面向:一是“唱歌”成婚,二是较为开放的性关系。二者往往接续在一起:“苗民土例,唱歌交合,即遣媒议聘,择订婚期。”(1077—1078)这在沈从文笔下同样得到承续,如《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写道:“他们本分之一,就是用一些精彩嘹亮的歌声,把女人的心揪住,把那些只知唱歌取乐为生活的年青女人引到洞中来,兴趣好则不妨过夜,不然就在太阳下当天做一点快乐爽心的事。”(第4卷 189)

第二,对歌。“唱歌”是沈从文小说中最常出现的苗地风俗。《媚金·豹子·与那羊》将对歌建构为世代传承的文化,男女之间的歌声是传达“情绪”的媒介,具有使人神魂颠倒的力量。这些“唱歌”的习俗,正与《野叟曝言》“男女婚配,俱先赶墟;本地之人,必男女唱歌投合”(1075)的言述相呼应。《边城》中的“走马路”,也延续了唱歌成婚的传统。即使汉苗混杂的茶峒在儒家礼制的影响下出现了车路和马路两种不同的婚恋方式,“唱歌”仍然未曾消失。可见,“唱歌”在苗地文化的建构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正如即便是《野叟曝言》中“只爱华礼,不守峒规”的儒家信徒篁姑,也仍然遵照“唱歌”的苗地婚俗。有趣的是,篁姑所执意坚持的汉苗混杂的成婚形式“第一,不上墟去唱歌,要兰哥到我家来,隔帘唱和;第二,唱歌时,女儿若和了,便算允了亲事,不就交欢,要行聘择吉,迎娶过门,合卺以后,才成婚礼”(1120),正与《边城》中翠翠所经历的婚恋故事重合,其中隐秘的承续关系依稀可辨。

第三,相对开放的性与性别关系。所谓“开放”是与汉地儒家的性与性别规范相比较而言

的,即与男女授受不亲的性别隔离、从一而终的性禁忌相左。《龙朱》和《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苗人男女在自然中阴阳相合,正与《野叟曝言》中“天气下降,地气上升,谓之交泰”“峒中风气,男女唱歌,互相感慕,然后成婚”(1121)等苗地知识相呼应。同时,在性别关系上,苗地也是开放的。《神巫之爱》写极了花帕苗女性追逐恋爱的主动,“花帕族的女人,在恋爱上的野心等于猓猓族男子打仗的勇敢”(第9卷 369)。小说描述苗人性别相对平等的关系,和《野叟曝言》所述“不分男女,见着都拉手抱腰”,乃至“有许多地方,女人喜欢男子,便瞒着父母翁姑丈夫,与他私偷”(1110)等一脉相承。

第四,“苗”的族群认识论。《野叟曝言》所承载的“苗地知识系统”在沈从文小说中的承续,还体现在另一更为幽微但也更加深刻的认识论层面,即前现代中国对于何为“苗”的认识。不同于现代民族学将“苗”视作整体均一的民族,“苗地知识系统”中的“苗”并非一个浑然的实体,实则包含多个从属的族群的概称。在《野叟曝言》中,苗地内部不同地域——不同“峒”——有着不同的文化,人们以“孔雀峒”“大鹏峒”“辟邪峒”“葵花峒”等地名进行自我认同,各峒中人对彼此差异有着清晰认识。当地人并不以“苗”来理解自身,而是认同于其所定居的地理位置,呈现多样纷繁的族群构成。沈从文将笔下人物细分为更加具体的族群,清晰地点明“苗”作为一个伞状名词的复数性——即所谓的“各苗族”(《龙朱》),包括“花帕苗”、“白耳族苗人”、“乌婆、猓猓、花帕、长脚各族”(《龙朱》)、“白脸苗”(《媚金·豹子·与那羊》)、“花脚苗”(《旅店》)等。沈从文不使用“苗”这一称谓,取而代之以汉苗混居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族群相互交融混杂所产生的新的“湘西人”主体,同样是以地名作为族群身份的依归,《边城》中的“茶峒”亦是一例。

其实,沈从文对苗地的再现,并未采纳现代民族学的话语。“他绝大多数时候用的‘苗人’而非‘苗族’这一称呼,一直到1939年的《湘西》,仍然使用‘苗民问题’而非‘苗族问题’。这些差异恰恰说明,民族学划分西南不同人群的方式,对当时的沈从文而言,是高度非自然的。”(袁先欣 168)这敏锐地点明沈氏的作品对前现代苗地知识的接受与承续:其对苗地的建构仍然沿袭“苗地知识

系统”中言说苗人的方式。《野叟曝言》中对于苗地的书写,实质上成了某种史料或历史知识,可以与沈氏的亲身见闻相互映照,更有助于他对“苗地”这个有悠长的历史跨度的、有相对均质连续的“传统”的文化和族群区域进行认知和认同。

二、“情”与“中国性”的话语模式

沈从文的苗地小说对《野叟曝言》的承续,不仅在于小说所叙述的苗地婚恋风俗,及其对于“苗”这一族群的认识方式沿袭自“苗地知识系统”,更体现在对于苗地的建构延续了《野叟曝言》中苗地当地人言说自身时所采用的“情”和“中国性”相互交织的话语模式:在刻画苗地之“情”的同时,言说了对于“何为中国”的独特理解。

(一)“情”与“中国性”:以本地人视角建构苗地的话语模式

首先,通过围绕“情”的话语,《野叟曝言》将苗地建构为一个有“情”之地。作为根植于儒家传统的哲学概念,“情”指向人类生而有之的情感、情绪。汉代以来,在佛教、理学的影响下,“情”带上了负面含义,与“性”“理”等纯善的概念相对立(黄卫总 20—48)。时至明清,理学家式的“情否定论”之外,出现了肯定“情”的价值的尚情思潮(合山究 51—72)。明清知识分子转而对“情”抱持了正面的看法。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重新阐释,“情”成为儒家秩序的核心、伦理道德的根基,是忠孝节烈之所以成立的基础,甚至被视作构成宇宙万物的本体。尚情思潮的知识分子或者强调“以礼节情”,坚持“情之正者”,或者在区分“情”和“欲”、“淫”的基础上将“情”视作全然的纯善,皆使得对“情”的崇尚与儒家伦理相调和,而非冲突对立(刘紫云 100)。但由于“情”不再被认为是同构于“理”的“性”之“已发”状态,而是美德本身,是有着本体地位的“理”的源头,因而获得了超越和更新既有儒家规范的潜力。

虽然在理论思辨中,“情”泛指君臣父子、夫妻婚姻、友朋交谊等各种人际关系的心理动力,但在实际言说中,“情”往往特指“浪漫爱”甚至性爱中人与人的纯善情感,此般关系形式被视作实践“情”的最高境界和最好场域。因此,尚情思潮往往以对浪漫爱情的歌颂展现,并通过情爱乃至性爱题材的小说和戏剧进入大众文化中去(高彦颐

83—94)。《野叟曝言》弥散着尚情思潮的影响,小说中频频出现“情”,儿女之爱中涌动的“情”被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灭情即灭性。如槁木,如顽石,虽生犹死矣!”(1779)“佛、老惩世人之溺于情,一切放弃,而并绝夫情,是因噎而废食也。”(1780)《野叟曝言》也强调“情”与“淫”的分野(黄卫总 210—223),但是《野叟曝言》中的苗人将“情”视作伦理合法性的来源——“王道必本乎人情”(1121)。在来自中原的文白和云北看来,“这峒里是个没廉耻的地方,不分男女,见着都拉手抱腰,爷长奶短的乱叫”(1105),是一个“无耻之地”(1119)。但是,从“情”的角度,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儒家礼制会产生“男女之情不畅”的恶果,相较之下,苗地的情爱反而更符合天地之道,这动摇乃至颠覆了儒家规范的经验合理性。

其次,《野叟曝言》对苗地的文学建构,和“情”相互纠缠出现的是“中国性”的话语。“中国性”概念强调现代意义的“中国”这一文化、族群或国家的能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不同的人群皆有着变动不居、错综参差的所指,因此需要对“中国”进行历史化、语境化的理解(Chow 1—24)。在《野叟曝言》中,充斥着许多区分“华夷之辨”、界定“何为中国”的“中国性”话语。其中汉人叙事者对于“何为中国”的言说,为追溯古代中国的主流“中国性”话语提供了重要资源。华夷之间的差异表征在于“文化”：“汉通西南夷之前，闽、粤以外，即属异域，从古不通中国，未闻圣人之教。”(夏敬渠 21)所谓“圣人之教”，即来自汉族的儒家礼乐文明，定义了“中国”的范围。

有论者指出,“中国”最初是指黄河流域的区域,是“华夏”这一政治体所居之处。“华夏”逐渐发展和确立了一套稳定的文化体系,成为判断族群异同的内外标识。随着华夏族疆域的扩展,“中国”覆盖的区域不断延伸。“华夏”自视为一个文化均质的族群共同体,当周围的地理区域被新纳入帝国治理后,教化随之开展。《野叟曝言》言:“俱秉天朝正朔,亦如中国之制,除灭佛、老,独宗孔圣,颁下衣冠礼制,用夏变夷。”(夏敬渠 1815)对“中国性”的认识反映在清代对苗地的治理中,延续明代对苗地的开拓,一方面“编户齐民”,扩大对苗地的实际统治,另一方面搭配以文化工程,使苗人“化生为熟”,最终被纳入“华”之中。至

少在十八省的区域内,清帝国的统治者仍然利用或接受了“汉族的统治标准和儒家正统”,以汉地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为标准“化苗为汉”(葛兆光 116)。当然,这一进程并不均质,如湘西南部的汉化程度始终未能成“熟”,因此其作为华夏边缘的“苗地”地位便一直被保留下去(谢晓辉,《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1—2)。

作为一个地理、文化和族群概念的“中国”与“文明”紧密挂钩,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汉地的儒家文化占据文明的最高位阶,被视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价值观。《野叟曝言》对此有精辟概括:“凡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只争在有廉耻;禽兽没廉耻[……]将来得奉皇上威灵,风行海外,用夏变夷,还要把大秦一国,俱秉中国婚姻之礼,不止全你两人廉耻,将并汝通国之人,都从禽兽中提拨至人类中来。”(夏敬渠 1358—1359)《野叟曝言》对文白平定苗地,使苗人最终接受儒家礼制的书写,反映出上述“中国性”话语如何深刻地参与了小说对苗地的建构。“一方面,作者要突显这些边域文化的细节有异于中原之处,另一方面,则要证明华夏文明的绝对优越性与儒家教化的普世性。”(胡晓真 257)《野叟曝言》以苗人叙事者的声音提出了另类的“中国性”,并以这一话语对苗地进行言说,建构出一幅本地人眼中的苗地图景。只有通过一种另类的言语,苗地才有可能不被言说为野蛮的边地,需要被“用夏变夷”,也才有可能不被边缘化为“内部他者”,将自身容纳在“中国”之中。

其一,《野叟曝言》中的苗人以“情”切入,质疑了内含于“中国性”话语中的文明阶序位置。在尚情思潮的逻辑下,苗峒男女自主的婚恋风俗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情”通达流畅,因而它最符合“天地之道”。换言之,其文明程度反而要比“中华”更高。这一诠释翻转了以往为汉文化所垄断的文明标准,驳斥了将作为地理、文化和族群范畴的“中华”与“文明之中心”相捆绑的“中国性”论述。值得注意的是,苗人据此伸张自身文化的合法性,但并未反向将汉文化贬为野蛮,而是以主人公文白听得懂的儒家的语言,使苗地文化的价值变得可以理解,表达渴望承认的“认同意识”(王文光 朱映占 91)和迈向主体间的平等关系。

其二,苗人叙事者对于“中国性”的重构,更在于对族群意义上的“中国性”的协商。在将“苗

峒”与“中华”(即汉地)比较后,苗人表示:“故合九州风气而论,要以葵花峒为第一。”(夏敬渠 1121)这句话不仅坚持自身的非汉文化在文明阶序中可被承认的主体位置,超越了既有的“文明等级”,还将苗地和前述的“中华”都放置在“九州”这一更大的范畴中。“九州”的概念相较于与“四裔”相对的“中国”所强调的汉文化意涵,更多指涉的是“中国”的地理疆域(王柯 19)。视苗地为“九州”风气第一之处,超越了将汉地等价于“中国”的“中国性”论述,“纳四裔入中国”,将“中国”拓展为一个容纳多种文化、多个族群的包容范畴,在认同“中国”的同时,强调中国在族群和文化上的多样性。此番“中国性”的话语,隐隐呼应了人类学者对西南地区的观察:一方面,苗地是“与中原互动了上千年的延续的华夏边缘,直到今天还保持了丰富多元的族群”;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苗人“都保持了对中国和中华民族非常高度的认同”(谢晓辉,《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基于湘西地区的一点反思》96),同一性和他异性之所以并行不悖,正是基于这一对“中国性”的理解。

在明清描述苗地的文本中,《野叟曝言》既承续了既有的“苗地知识系统”对西南非汉族群风俗文化的认识方式、弥漫着华夷之辨的文明阶序观念下对西南地区的成见,也创造性地虚构出与主流话语分庭抗礼的苗人声音。“情”和“中国性”的交织是实现这一建构的话语模式,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延续。

(二) 话语模式的承续:沈从文的苗地建构

沈从文的苗地建构,整体上注意以“情”的概念去勾勒苗地的文化特质,同时以苗地为落脚点对“中国性”展开论述,实现了对同时代关于“何为中国”的主流话语的超越。

第一,沈从文延续了《野叟曝言》对苗地婚恋风俗的聚焦,承续了借当地人之口、以“情”言说苗地文化的话语模式。在前期的《雨后》《柏子》《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等苗地小说中,沈从文延续了明清文学中的“知识系统”,将苗地建构为《野叟曝言》所述婚恋、性爱相对自由,男女交往开放的地区。同时,他使用“情”的话语对苗地文化进行表述。如《龙朱》所言,乌婆苗人来自“以出产多情多才貌女子著名地方”,他们“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

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第5卷327)。苗人不顾世俗礼教和利益考虑的情爱,正是“不许男女自主,两情岂能投合”(夏敬渠1121)的说明,被视作一种美德。

在《边城》中,沈氏同样围绕“情”对湘西人进行建构。与《野叟曝言》中的尚情话语一脉相承,《边城》也将女主人公翠翠刻画为“有情”之人,通过书写男女情爱中的纯善情感,来表现湘西人的有“情”特质。湘西人的“爱憎与哀乐”的情感、“极其美丽”的性情,都被尚“情”的话语所强调出来,成为沈氏书写湘西的中心关怀。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指出:“就我所接触的世界一面,来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即或这枝笔如何笨拙,或尚不至于离题太远。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我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第8卷57)这些苗地小说弥散的“情”的话语,不仅在于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认领,如沈自认20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第12卷127),更体现在《野叟曝言》中的尚“情”话语在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中的延续^④,成为沈氏用以建构苗地的重要关键词。

第二,“中国性”的话语在沈从文的苗地建构中也占据重要位置,承续了《野叟曝言》中重构“中国性”的问题意识。沈氏曾在《边城》题记中谈及创作意图,在他看来,湘西在“大多数读者”眼中,是“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一个陌生的世界”,处于“他者”的边缘位置,是一处并不为他的读者群——民国时期的汉语知识分子——所了解的地方。但他希望指出,湘西其实承载着“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因而集中了中国失落了的“伟大处”,代表了民族“真正的”“性情”(第8卷58—59)。换言之,由于湘西人的有“情”特质得以代表中国最为伟大的价值,使苗地成了定义“何为中国”的最佳样本。沈从文首先赋予“情”以崇高的纯善价值,翻转了既有的“中国性”论述,使湘西由边陲之地的“外”一跃被接纳为“中国性”的“内”。这呼应了《野叟曝言》中苗人以“情”重构“中国性”的论述:“故合九州风气而论,要以葵花峒为第一。”(夏敬渠1121)

和《野叟曝言》一样,沈氏将“湘西”建构为整个中国的“伟大处”,依靠的是不同于主流叙述的

另类“中国性”话语。此时他所对话的,既包括古代的“中国性”话语的遗产,更有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所新形成和发展的“中国性”观念。通过书写苗地的情爱故事,展现苗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沈氏反驳了苗人在民国知识分子心中的“蛮族”印象,对话了古代的“中国性”话语遗产所制造的华夷文野阶序。在《苗民问题》一文中,沈氏提到帝制时期在苗地所实行的族群政策,“统治一省的负责者,在习惯上的错误,照例认为必抑此扬彼,方能控制这个汉苗混处的区域”,指出苗人在帝制中国的“蛮夷”地位——“湘西在过去某一时,是一例被人当作蛮族看待的。虽愿意成为附庸,终不免视同化外。被歧视也极自然”(第11卷409)。他进而认为,这样的观念之所以延续至今,正是由于既往的偏见仍然透过“记载和传说”的媒介形塑着“读书的”外地人对苗地的认识。换言之,古代中国的“苗地知识系统”,仍然在民国时期产生影响。苗地在主流话语中“蛮悍”和“愚蠢”的形象,正是沈氏借助对苗地之“情”的书写所要匡正的偏见。

然而,沈从文建构苗地所采用的“中国性”话语有别于上述将非汉族群视作蛮夷、视作非“中国”的传统观念。通过将苗地视作“民族的伟大处”,他驳斥了将“中国”等同于汉文明、将非汉文明斥为野蛮,从而推导出“以夏变夷”的“中国性”论述。正如《凤子》中苗地本地人为“决斗”风俗作出的辩护:“这是种与中国一切原始的文明同时也可称为极美丽的习俗,行将一律消灭的点点东西!”(第7卷146)沈从文的苗地小说以“情”凸显苗人和汉人的差异,意在表现苗地的美德,翻转了传统的“中国性”话语。《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他们的口除了亲嘴就是唱赞美情欲与自然的歌,不像其余的中国人还要拿来说谎的”(第4卷189),与《野叟曝言》中“心所亲爱,复得抱腰捧脸,以致其情;其气既畅,不致抑郁遏塞,一决而溃为钻穴逾墙等丑事矣”(1121)的言述如出一辙,其承继关系可见一斑。

第三,沈从文的苗地文学建构,也对话了同时代的许多“中国性”话语。视“中国”为单一文化和族群的共同体,将苗人视作“中国”以外的野蛮他者的“中国性”认识,不只是帝制的专利,也在现代中国被重新发明,例如晚清革命党人将“中国”等同于汉族,以及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华民族

“一元一体”、否认非汉族群的国族地位的同化论认识(励轩 211)。此一观念反映在苏雪林《沈从文论》(1934年)对沈从文的评论中:“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廿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五胡十六国之际鲜卑,匈奴,跼蹐等族,以及唐以后辽金元清等游牧民族之同化于我,衰老身体里也增加不少新鲜血液。”(苏雪林 456)在苏雪林看来,苗人并不在“中华民族”之内,苗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是“野蛮人的血液注射”的被“同化”关系。事实上,苏雪林对“中国性”的理解并非孤例,实则反映了来自西方并经由日本之中介传播而来的现代种族和国族观念,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在民国时期话语场中的流行,包括以将人群视作不同种族并以血液等生物学意象本质主义地理解族群边界、将国族视作单一同质并导向排他和同化的族群民族主义,以物种竞争理解族群兴亡、把时间的新旧(“老迈龙钟”和“年青”)作为价值衡量的标准等(杜赞奇 17—49)。而将中国描述为“颓废腐败”,更可窥见西方殖民主义的“国民性”话语的深刻影响,这与古代中国以“华”为“文明中心”的传统“中国性”论述截然不同。可见,在经历了西学洗礼的民国中国,对“中国性”的理解和帝制时期已然有所断裂,更多是为西方现代的种族话语所塑造。

通过苗地小说,沈氏提出了对于族群意义上的“中国性”的另类认识——汉与非汉族群共存的多元性。“中国性”不应仅指向汉人,更包括苗人等非汉族群,同时更是一种超越族群分类的混杂性,强调族群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融,而非单方的同化。沈氏没有一味强调湘西人族性为“苗”,而是再现了汉苗混居百年后文化的交织。他在《我的小学教育》中回忆其故乡湘西镇筵时,点明汉人与苗人“融合成一锅”,“所谓‘杂种’,就很多很多”,而“苗人们勇敢,好斗,朴质的行为,到近来乃形成了本地少年人一种普遍的德性”(第1卷 263),这正是多民族交往交融历史下的中国人“多元一体”的族群混杂性。沈氏以族群混杂的“中国性”话语建构苗地,不但更接近史实,也有助于打破文化本质主义的神话。沈氏对苗地的建构、对“中国性”的重构,承续并超越了《野叟曝言》的文学遗产。

三、作为方法的苗地

20世纪初的中国,“情”的话语出现了谱系学的转型。“情”不再用来佐证儒家礼制的合理性,儒家知识分子调和情礼、视“情”为美德的尚情主义虽然依旧延续,但已不再是中国人理解情感和情爱所依赖的唯一的感受结构。跨语际能指的“爱情”和“自由恋爱”成为“情”这一传统概念在现代语境下的新变体,并更多地与“现代性”相缠绕勾连:在个人与社会秩序的冲突中得以实现的“自由恋爱”被视作割裂传统的现代性的标志,男女情爱所产生的脱离家族纽带的有情个体则被理解为现代民族主义的基础(Guo 39)。同时,“中国性”话语,也在19世纪晚期殖民现代性的进程中出现了深刻转变。曾经作为“天下国家”的“中国”嵌入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传统上将“中国性”等同于道德文明的中心的“华夷之辩”受到了持续挑战。关于种族、民族和民族国家等现代知识体系的传播,推动了现代中国人对“中国”概念产生了全新理解。

在此语境中,沈从文对苗地的“情”的故事念兹在兹,所为何事?特别是其后期的湘西小说,不同于前期苗乡故事的时空渺茫(彭小妍 385—411),而是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明确地安排在辛亥之后。由此,从“情”与“中国性”的角度重读《边城》,我们进一步分析沈从文的苗地小说,如何通过书写苗地之“情”言说另类的“中国性”,从而对国民性和文化传统意义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中国性”话语进行反驳,以此激发出其湘西建构所蕴含的批判潜力与思想深度。

(一) 以“情”重述国民性意义上的“中国性”

“中国国民性”的理论筑基于欧洲启蒙时代知识分子言说中国的话语系统(周宁 42),又因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的著作的传播在东亚流行开来,常带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他者凝视下对于非西方地区总体化的偏见。“国民性的话语一方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方面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刘禾 104)

在国民性话语中,中国人的情感被屡屡提及,中国人被论述为缺乏情感、缺乏同情心,甚至不会

感受到疼痛的种族。^⑤这可以追溯到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对个体情感的强调和重视,以及这一称之为情感自由主义的思潮演变而来的情感帝国主义(sentimental imperialism)(Li 156—220)。作为一种情感帝国主义的话语,“中国国民性”将中国人他者化为麻木、无情因而野蛮的、病态的种族。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下,国民性理论合法化了强势国家的殖民和侵略行为,将之解释为“国民性”层面上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之间的优胜劣汰。此后,日本也发展出类似的逻辑,提出“风土论”的和辻哲郎便将日本人描述为与麻木的中国人相反、富于情感的国族。通过建构“中国国民性”,塑造出日本和中国的阶序关系,合法化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雄心(李海燕 241—246)。国民性话语对中国人缺乏情感的认识,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伴随着反传统的革新壮志,成为五四时期的流行话语(刘禾 74—76)。陈独秀即指出,“卑劣无耻退意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恰恰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在这一将否定“中国性”作为现代化前提的语境中,《新青年》杂志复制了西方殖民话语对中国国民性的描述,不乏自谓“劣等民族”“准狗”和“准猪”之辞。以批评中国人为麻木不仁的看客著称的鲁迅,也内化了国民性的框架,将改造无情的中国人的灵魂视为寻找中国出路的底层思路。

《边城》的苗地书写,也应被视作一种对“中国国民性”的讨论(迟蕊 120)。书写“性情”,让读者“明白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以呈现民族的“伟大处”,诚为沈从文书写《边城》的用意所在。他在《题记》中指出,《边城》所面向的读者是想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的人。而沈从文展现中华民族的“好处”“过去伟大处”的方式,是通过“叙述他们的爱憎与哀乐[……]因为他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第8卷57)。民族的伟大在于情感——爱憎与哀乐,而情感则是性情的重要表现,“性情”的主语是民族国家的国民。沈从文所讨论的正是所谓的“国民性”之伟大处,他对苗人之“情”的讨论是明确地与国民性意义上的“中国性”相挂钩的。

沈从文从两个方面重述了国民性意义上的

“中国性”,以此反驳国民性理论。

第一,他将国民性视作随历史而变动的建构物,而非生物性的种族本质。在《边城》题记中,沈从文指出国民性情随时代而变,他之所以想要再现过去中国人的性情,是因为“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第8卷59)此处“鸦片烟”所喻指的,便是西方的殖民暴力。而“性格灵魂”,正如鲁迅在描述中国国民性时所用的“魂灵”一词。沈从文通过揭示国民性现状的历史性,有力地解构了对中国人性格的本质化叙述。

第二,《边城》通过建构湘西人的丰富情感和情爱故事展示中国的“人情”,反驳指认中国人缺乏情感的国民性论述。在《野叟曝言》中,苗地就是“九州”内部一个有“情”之地,由于男女情爱通畅,因而“地气通乎天,天气通乎地”(夏敬渠 1121)。延续《野叟曝言》中的苗地建构,沈从文书写中国人的情感、“爱”和“健康的人生形式”,举出情感帝国主义下“国民性”话语的反例,重新表述了“中国性”。由此,沈从文将《野叟曝言》的文学遗产,转化为批判殖民主义、重构“中国性”的话语资源。

(二)以“情”重述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性”

“现代”作为西方的一个历史阶段,原指16、17世纪的欧洲在革命、殖民等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变革和发展后,展现出与过往差异巨大的全新面貌。西方语境下的“现代”与“传统”,原仅属于时间性的区隔,是一种“将现在同过去界划或疏远开来,并美化这种差异”的意识(德里克 172—173)。然而当这一套“现代性”话语被抽出原有的历史脉络,置入全球的语境,“时间”的差异便被空间化。在线性进步的历史轴线上,西方处在文明进化的时间轴的前端,而非西方地区则被视作传统的和落后的,需要通过抛弃传统来进入现代。这一套“现代性”话语建构了非西方代表传统、落后、野蛮,西方对应现代、先进、文明的二分法,不仅成为近代西方殖民的意识形态,也为非西方的进步知识分子所内化(杜赞奇 17—49)。五四前后,围绕“自由恋爱”的论述复制西方“现代性”意识形态背后的进化史观和中西之间的等级

阶序,忽略了中国内部族群、地域、阶层等差异,将中国传统进行了单一的简化(赵妍杰 325)。高彦颐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中国传统’是一项非历史的发明”,“‘五四’对传统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与其说是‘传统社会’的本质,它更多告诉我们的是关于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想象蓝图”(高彦颐 3—4)。不仅“中国传统”,五四时期的自由恋爱话语中代表“现代”“文明”的“西方”也同样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然而,反传统的“现代”蓝图内蕴的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和对“中国性”的整体化负面认识,显示出他们的感觉结构已浸染了文化权力远不对等的西方殖民体系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虽然现代性作为研究近代中国文化政治的主流范式已受到质疑,认为这一抽象的时间概念遮蔽了非西方世界更为细致的历史细节(柯文 88—92),然而理解沈从文的文本时,选择现代性框架仍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沈从文对于“现代性”始终抱持一种反思的态度。在《习作选集代序》中,沈从文有意识地以“现代”为时代症结命名:“城市中人[……]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第9卷 4)这明确点出他的小说所对话的是“现代”社会。“现代性”是沈从文自觉的意识,而非评论者强加的诠释框架。受到五四感召,只身上京的沈从文,实则与反传统知识分子共享了许多现代价值理念(吴正锋 81),但他意在更进一步,通过重述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性”,畅想一种另类的现代性。他的“现代”图景不贬斥非西方地区的主体性,不以否定总体化的“传统”为前提,因此并不根植于殖民主义色彩的“中国性”论述。沈从文承继《野叟曝言》的知识系统,将苗地建构为一个有着非包办婚姻传统的有“情”之地,采取近似于自由恋爱的叙事铺陈苗地的男女情爱,表达对于“自由恋爱”及其所譬喻的“现代性”的积极态度。

然而,这些苗地故事迥异于五四时期典型的自由恋爱小说,是显而易见的。后者对于“现代”的追寻往往建立在与传统的割裂、对于“中国性”的拒斥上,并导向一种对西方“现代”模式的复制。苗地小说“情”的故事则提出理解“现代”的

另一种路径:现代性不必来自万流归宗的西方,不必建立在对本土传统的贬斥之上,甚至不必追求线性进步的发展,而是通过考掘“过去伟大处”,于多元复数的传统之中生发。通过将“情”的话语进行知识考古或历史化,便会发现,沈从文的观点,无疑受到将自由恋爱作为现代性的标志这一时代性的对“情”的感觉结构之影响(李海燕 8—9)。因此,指认《边城》中的自由恋爱情节蕴含了现代性的理念,并非意在附会沈从文作品的“合现代性”,也并不意味着沈从文的情爱书写是对主流话语的亦步亦趋。因为他无法自外于时代,却已然有所超越,表现在他通过重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的去西方中心化的阐发。进而言之,《边城》中的男女追求爱情这一“现代”价值,并不通过对抗性的革命和与传统的断裂来抵达。相反,由于苗地的传统是“中国性”的重要组成,在中国内部,异质多音的地区文化早已生发了现代性的潜力。沈从文小说以“情”的话语说的“苗地知识”所建构出的苗地更进一步超越了近代西方的“自由恋爱”模式。因为苗地的婚恋并未如前者,在浪漫爱的背后预设了专偶制、既定的性别角色,乃至保守的性禁忌等重重规范。

经由对《野叟曝言》所记叙的苗地之“情”的承继,沈从文揭示中国传统的多元和复数性,在传统文化的面向上重新定义“中国性”,从而解构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话语所采用的“普世父权制”(Butler 5),批判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整体性贬斥,动摇西方对现代性的专利权,提供了以“消灭中国旧的一切”为前提的单一现代性以外的、另类的中国现代性图景。进而言之,“苗地”是“方法”,通过建构苗地,沈从文辨析了半殖民地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问题。

结 语

我们通过展现《野叟曝言》和沈从文小说对苗地的文学建构在知识系统和话语模式上“自在”(in itself)的承续关系,重建前现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连续性,并通过互文的阅读挖掘出沈从文苗地小说的批判潜力。《野叟曝言》是沈从文及其同代人身处的“思想的媒介世界”中的重要版图,这一流传于民国时期知识界和大众传播的文学文本,客观上构成了作为湘西人的沈从文从

本地人的发声位置对苗地进行文学建构时所凭依的视野;他还能动地在其基础上有所超越。将沈从文的苗地建构放置在其所身处的“媒介世界”,有助于进一步解答当代研究者指出的沈从文小说的“内部东方主义”问题^⑥。沈从文延续明清文学中“苗地知识系统”对于苗地婚恋风俗和性别制度的再现偏好,承继《野叟曝言》中从苗人的视角建构苗地时采用的“情”与“中国性”的话语,是通过策略性地挪用既有的话语为苗文化正名、建构苗人主体性的艰难尝试。同时,强调沈从文的苗地小说对“现代性”的思考筑基于《野叟曝言》,是为了看到沈从文身处的“媒介世界”在他思考中国现代性时扮演的作用,即他是如何通过考掘前现代的文本和知识,在国民性理论和反传统论述之外作出对“中国性”的另类理解的。“文学遗产”并非静止的死物,而是生生不息地参与了历史的进程,如本雅明所谓的历史的“虎跃”(tigersprung)一般,文学遗产所能爆发出“乌托邦的潜能”(本雅明 273)为当下的新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能量。

注释 [Notes]

- ①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后文所引沈从文作品,皆出自此版本,随文标注卷数及页码。
- ② 参见任晓兵:《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12):23—27;吴翔宇:《沈从文小说的民族想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
- ③ 湘西处在中国腹地,与中原互动千年,却始终未汉化,“展示为相当坚挺难移的华夏边缘”,直到民国时期,仍与“边疆”“边政”“边城”等词挂钩。(谢晓辉《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1—2)。
- ④ 明清时期“情”的话语在晚清、民国时期的持续传播与发展,参见邓瑗:《晚清至“五四”文学批评的人性话语研究(1897—1927)》。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
- ⑤ 19、20世纪西方汉学界围绕情感的中国国民性话语,参见韩瑞:《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与中国疼痛》,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韩瑞:《图像的来世:关于“病夫”刻板印象的中西传译》,栾志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
- ⑥ 参见周子玉:《湘西世界:沈从文笔下的他者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2017):159—168;杨玉珍:《〈边城〉的民族伦理与性别叙事》,《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12):1—5;庞书纬:《朝圣之旅——“内部东方主义”视野下的沈从文湘西小说》,《北京大学研究生学

志》4(2008):13。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瓦尔特·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 Zhang Xudong and Wang B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
- [Chen, Duxiu. “Resistance.” *Youth Magazine*. Volume 1, No. 3, November 15, 1915.]
- 迟蕊:《新文学“国民性改造”脉络中的沈从文》,《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17):120—129。
- [Chi, Rui. “Shen Congwen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Character Transformation’ in New Literature.”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2017): 120—129.]
- Chow, Rey. “Introduction: On Chineseness as a Theoretic Problem.” *Boundary 2* 25.3 (1998): 1—24.
-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 [Cohen, Paul A.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Trans. Lin Tongq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2.]
- 阿里夫·德里克:《全球现代性》,胡大平、付清松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Dirlik, Arif. *Global Modernity: Modernity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Trans. Hu Daping and Fu Qingsong.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Trans. Wang Xianming, et al.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 [Ko, Dorothy.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Trans. Li Zhishe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5.]
- 葛兆光:《历史中国的内与外:有关“中国”与“周边”概念

- 的再澄清》。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
- [Ge, Zhaoguang. *The Inside and Outside of Historical China: A Reclarific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China" and "Surrounding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17.]
-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刘洪涛、杨瑞仁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289—294。
- [Guo, Moruo. "Rejecting Reac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Research Materials on Shen Congwen*. Vol. 1. Eds. Liu Hongtao and Yang Ruiren.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289 - 294.]
- Guo, Ting. "Politics of Love: Love as a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Political Leaders." *Critical Research on Religion* 8. 1 (2020): 39 - 52.
- 胡晓真:《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7年。
- [Hu, Siao-chen. *Southwest Narration in Ming and Qing Literatur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ublishing Center, 2017.]
- 黄卫总:《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张蕴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 [Huang, Martin W. *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rans. Zhang Yunshuang. 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合山究:《明清时代的女性与文学》,萧燕婉译。台北:联经出版社,2016年。
- [Kiwamu, Goyama.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rans. Xiao Yen-wan.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2016.]
- Li, Chen. *Chinese Law in Imperial Eyes: Sovereignty, Justice, and Transcultural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8.
- 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修佳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 [Li, Haiyan. *Revolution of the Heart: 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 1900 - 1950*. Trans. Xiu Jiam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 励轩:《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英译及其内涵演变》,《学术月刊》2(2022):205—215。
- [Li, Xua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Connotational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s Related to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the Modern Times." *Academic Monthly* 2 (2022): 205 - 215.]
- Liu, Lydia, Rebecca E.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 - 1937*. Trans. Song Weijie,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 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Liu, Hongtao. *A New Discussion on Shen Congwen's Fictional Works*.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5.]
- 刘紫云:《“痴病”与“情痴”:晚明情感话语在〈红楼梦〉中的回响》,《红楼梦学刊》6(2021):88—109。
- [Liu, Ziyun. " 'Idiotic Disease' and 'Love Idiot': Echo to Emotional Discourse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Studies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6(2021): 88 - 109.]
- 龙仙艳:《苗族多重表述研究(1928—194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 [Long, Xianyan. *A Study on Multiple Expressions of the Miao Ethnic Group (1928 - 1948)*.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20.]
- 罗维庆 罗中:《湘西行政区划的沿革与整合》,《民族论坛》4(2008):6—7。
- [Luo, Weiqing and Luo Zhong. "Evolution and Integr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 Xiangxi." *Minzu Tribune* 4 (2008): 6—7.]
- 彭小妍:《沈从文的乌托邦世界——苗族故事及乡土故事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1991):385—411。
- [Peng, Xiaoyan. "Shen Congwen's Utopian World: A Study of Miao and Local Storie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1 (1991): 385—411.]
- 任晓兵:《沈从文乡土小说对民间文学的移用》,《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2013):127—131。
- [Ren, Xiaobing. "The Application of Shen Congwen's Native-Soil Stories to Folk Literature."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2013): 127—131.]
- 商伟:《小说戏演:〈野叟曝言〉与万寿庆典和帝国想像》,《文学遗产》3(2017):155—167。
- [Shang, Wei. "Fiction and Drama Performance: A Country Codger's Words of Exposure and the Longevity Celebration and Empire Imagination." *Literary Heritage* 3

- (2017): 155 - 167.]
-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 [Shen, Congwen,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en Congwen*. Taiyuan: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 宋剑祥:《沈从文利用图书馆钩沉》,《图书情报研究》1(2011):31—35。
- [Song, Jianxiang. "Exploration of Shen Congwen's Use of Library."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1 (2011): 31 - 35.]
- 苏雪林:《沈从文论》,《苏雪林选集》,沈晖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448—461。
- [Su, Xuelin. "On Shen Congwen." *Selected Works of Su Xuelin*. Ed. Shen Hui. Hefei: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9. 448 - 461.]
- 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 [Wang, Ke. *From a Country of "Tianxia" to a Nation State*.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20.]
- 王文光 朱映占:《承认与认同: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份建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12):84—92。
- [Wang, Wenguang, and Zhu Yingzhan. "Recogn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 (2012): 84 - 92.]
- 王晓文:《论中国现代文学边地书写的双向文化互动》,《理论学刊》6(2021):153—159。
- [Wang, Xiaowen. "On the Bilateral Cultural Interaction of Borderl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ory* 6(2021): 153 - 159.]
- 吴正锋:《论沈从文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城市学刊》2(2022):80—85。
- [Wu, Zhengfe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en Congwen and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Journal of Urban Studies* 2(2022): 80 - 85.]
- 席会东:《明清地图中的“苗疆”与“生苗”》,《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1(2020):36—44。
- [Xi, Huidong. "The 'Miaojiang' and 'Shengmiao' on the Map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1(2020): 36 - 44.]
- 夏敬渠:《野叟曝言》。长春:长春出版社,1992年。
- [Xia, Jingqu. *A Country Codger's Words of Exposure*. Changchun: Changchun Publishing House, 1992.]
- 谢晓辉:《西南民族地区的历史书写与历史——基于湘西地区的一点反思》,《新史学》1(2020):81—98。
- [Xie, Xiaohui. "Historical Writing and History in Southwest Ethnic Areas: A Reflection on the Xiangxi Region." *New Historiography* 1(2020): 81 - 98.]
- :《制造边缘性:10—19世纪的湘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 [---. *Making Marginality: Xiangxi from the 10th to 19th Centurie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1.]
- 徐新建:《西南研究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 [Xu, Xinjian. *On Southwest Research*. Kunming: Yun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2.]
- 袁先欣:《沈从文三十年代中后期湘西叙述中的民族与区域》,《文学评论》2(2021):165—175。
- [Yuan, Xianxin. "Nationalities and Regions in Shen Congwen's Narration of Xiangxi in the Mid to Late 1930s." *Literary Review* 2(2021): 165 - 175.]
- 张文东:《“传奇”传统与“边城”想象——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传奇”叙事》,《中国文学研究》1(2008):59—62。
- [Zhang, Wendong. "The Tradition of 'Legend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Border Town': On the Narration of 'Legends' in Shen Congwen's 'Xiangxi Stories'." *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1(2008): 59 - 62.]
- 赵树冈:《边地、边民与边界的型构:从清代湖南苗疆到民国湘西苗族》,《民族研究》1(2018):70—78。
- [Zhao, Shugang. "The Typology of Border Land, Border People, and Boundary: From Hunan Miao in the Qing Dynasty to Xiangxi Miao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Ethno-National Studies* 1(2018): 70 - 78.]
- 赵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 [Zhao, Yanjie. *Family Revolution: Intellectual Visions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1895 - 1923*.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2020.]
- 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文艺理论与批评》5(2003):41—53。
- [Zhou, Ning. "'Being Expressed by Others': The Genealogy of Western Discourse on the Criticism of National Characters."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5(2003): 41 - 53.]
- 周仁政:《巫覡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
- [Zhou, Renzheng. *Wizard Humanities: Shen Congwen and Wu Chu Culture*. Changsha: Yuelu Press, 2005.]

(责任编辑:张均)